



您雪白的頭髮，曾經在我們
眼中紅過；
您光芒的眸子，曾經在我們
身上燃燒過。
您澆遍了多少園圃，不曾領
功；
您開墾了多少荒土，不曾榮
耀。



杏壇園丁

■訪心靈的工程師趙麗蓮博士

胡有瑞

十二年前，當趙麗蓮博士從臺大退休時，臺大的學生們包圍着她，用詩句、用淚眼，惜別他們崇敬的師長。

那是極感人的一幕，頭髮雪白，眸子閃亮的趙教授，以含淚的微笑，接受着學生們給予的摯情，五十多年春風化雨的日子裏，她是真的記不起曾經灌溉和開墾了多少的園圃和荒土。

雖然已經是十二年過去了，可是，那惜別的場面一直停留在好些人的腦海中，尤其是這位「心靈的工程師」，用她那獨特、美雅又帶着顫抖音調所作的英文告別詞，更是令人感動、難忘。

當年，她是這樣說的：

「此刻，我不知應該是笑呢，還是哭，我想我應該哭，因為這是高興的哭，感動的哭；爲了有這麼多愛我、關懷我，我要哭。」

「爲什麼我要做一個老師呢？因爲我生下來的時候，很使父親失望，因爲他希望生一個男孩子，但是我是一個女孩子，我爲了使父親高興，儘量表現男子氣概，我游泳、我溜冰……不過父親說，女孩子也可以做男孩子的事，我要教書，教許許多多人懂道理，

求學問。

「在臺灣，我孤零零一個人，兒女均淪陷在大陸，故而我把母親的心獻給每一位學生，爲他們分擔痛苦，與他們共享快樂，我對每一個人的期望都很高，我真的不希望學生們再讓我失望了，在以往數十年的教書生涯裏，我對大部分我教過的孩子們很失望，他們出了校門不幾年，就把我平日教誨他們的道理拋得遠遠的。」

「我生長在美國，可以做一個美國人，可是我不願意，那兒沒有人情味，沒有尊師重道觀念，那裏是老年人的墳墓，似乎頭髮一白，就該死了似的。在臺灣就不同，你們把我看得這樣寶貴，在這樣炎熱的天氣，孩子們爲我流汗爲我跳舞，固然我說過，許多孩子曾令我傷心，但是，孩子也使我歡笑。」

「我要從臺大退休了，因爲我在教室裏常常忘了拼字，常常……但是我還要從事空中教學的工作，這個工作可以在家裏錄音，我可以穿着拖鞋，可以不梳頭，自由自在地把我所知道的這麼一點點，完完全全地貢獻給多難的國家，貢獻給好學的青年、軍人、店員……」

「此外，我還要到鄉村去幫助中學教員改善英語教學，我不要依賴別人，我要自己做。」真的，這十多年來，她真的是退而不休，不但在空中教學，她還穿起了大花裙，在電視上開關了「鵝媽媽教室」，我常常想，她是位精力過人的「老人」，也是位有教無類的「老師」。

寂寞的童年

「我是民國前十二年生的，七十七年來，我由美國來到中國，看着中華民國誕生，也隨着她歷經時代的憂患，我想，我的感觸，我的遭遇，與別人絕不一樣。」

趙教授常常這樣對我說，坐在她那間清簡，帶着一絲蒼涼味的客廳中，我能體味得出，她平靜緩和語調中，所蘊含的感情，以及那七

十年來悲歡人生的點點滴滴。

「七十七年來，我的所見、所聞、所感、所受，真是與別人大大不同，可以說，我很幸運，也可以說這是不幸。」



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是：「我的父母，一位來自東方，一位來自西方。」

「我的心中常常有着混亂的感覺，不知道該偏向何方才好，偏父親？還是偏母親。」

在她的腦海中，永遠留着五歲時的一頁記憶，而那小小的一頁，竟然操縱了她這一生的歲月。

「我生長在美國，五歲時，我隨父親回到中國，還記得，船到了黃海，真奇怪，海水一半藍，一半黃，就像刀切的一樣，一點也不混亂。那時只覺得好奇，等到歲數大了些我才了解，上天交給我的，就像那海水一樣，一半東，一半西。」

就因為這樣，這一生她永遠覺得孤獨。「我老覺得自己與別的玩伴不一樣，黃頭髮、藍眼睛，我的頭是圓的，他們是扁的。於是，我就只有一個人玩，後來，我一直是一個人，到現在還是一個人。」

「做一個混血兒是很痛苦的事，不管怎樣，偏東方，西方人看你是怪物，偏西方，東方人又用另一種眼光，真苦。」

因此，在孤獨的童年生活中，以及在悲苦的成長歲月裏，她緊緊掌握住兩個人生的方向：「不靠人」

、「要比別人好」。

「我常常想，如果不是這兩個信念支持我，我這一生也就早完了。」

她又說了一個童年的故事：

「三歲時，我含着奶瓶上幼稚園。

那個幼稚園離家很近，中間要經過發明家愛迪生的家。那時，他已經很老了，每天坐在園中，我常常走過去與他玩。

在幼稚園，同學都不理我，而且還挖苦我，回家的路上，我總是一面走一面哭，愛迪生問我：『爲什麼哭，』我告訴他，同學欺負我，他們說中國人吃老鼠、吃狗肉的。我問愛迪生：『我與別人爲什麼不一樣』，他告訴我：『重要的不是你的外表，而是你的內心，不要哭。』」

這幕童年的情景，趙教授說，她終生難忘，而且，永遠記得愛迪生慈祥的容顏，以及那懇切的談話。回到了中國，趙教授的童年，依然受到了混血兒之苦。

在上海時，父親送她進入美國學校讀書，「我記得養珍珠與我同學，我還去她家玩過。」

當時在中國的美國人，生活都較富裕，吃的、住的，都極好，而在學校，老師對趙教授的看法自然就不同，「我小時，不愛洗脖子，老師每在吃飯時就愛揪着我的耳朵對大家說：『你們看，中國小孩多髒，因為，她身上有着中國血統。』」

「每遇這種情形，我都以沉默來反抗一切，有一天，我故意將自己的一邊臉弄黑、弄髒，然後，對大家說：『我的這一邊是外國人的血，所以黑黑髒髒的。』」

快七十年前的往事，趙教授依然記得清清楚楚，她忘我地回憶着，眸子中閃過了一道又一道的光，那光采，那神色，平靜中帶着跳躍，霧色中有着雨絲，我靜靜地聽着，記錄的手却有點輕輕地顫抖。

「實在說起來，如果一個人能自己選擇父母的話，我都可以說是很幸運的，因為，我父母的家世和學問都好，只是，我總感覺，做一個混血兒很痛苦。」

她的父親趙士北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律博士，曾是中華民國第一屆參議院的議長；母親，是德國駐土耳其公使的女兒，康乃爾大學醫學博士。「一個是中國留美學生，一個是從歐洲到美國學醫的小姐，同住在

一個老太太的家中，於是，兩個人就認識了。」

在兩位都同樣卓越的父、母教育下，趙教授也比別人有着太多不同的感受。

「剛剛回到中國不久，我就體味出，父母之間有着不小的磨擦。」

母親常常對她說：「中國男人對女人不够體貼，生你的時候，你父親一些也不關心，也不着急，外國男人可就不一样了。」

而父親與母親對她的教育方式也不同；「遇到可怕的事物，母親總叮嚀她別接近，譬如水、火等，而父親就不同，他認為應該讓我接近，這樣我就會小心，但不會害怕。」

在她的記憶中，這一直是極鮮明的一頁，同時，這難忘的一幕，為她的教學生涯帶來極大的啓示。

「爲了讓我知道水，父親竟帶我到游泳池中，把我扔下去，當時，我不僅不怕水，而且還學會了游泳。」

「母親對我，總是用講理的方式，而父親，遇到我做錯事，不說一個字，就是打。」

趙教授笑着說：「我從小就調皮，幾乎每天都挨

打，很奇怪的是，父親愈打我，我愈愛他，母親愈說理，我反而覺得討厭。」

從自己的經驗中，趙教授主張「打」是教育上的一個好法子。「我教育我的孩子，就是用打，不過，要打必須打屁股，絕不可亂打。」

在童年的故事中，這也是淒涼且回味深深的一段。

「我不信教。」

她一說，我真楞住了。因為，在想像中，她一定是位虔誠的教徒。

她說：「我們初回國時，那些傳教士很神氣，優越感很深，他們對我母親極冷淡，每每使母親感到難受。慢慢地，也使我對宗教冷淡了下來。」

最難忘的是：「父母要我上主日學，由於那時我還不會說中國話，在進入外國人聚會的教堂時，有個很胖、很胖的女人站在門口大叫：你是中國小孩，不准進來。」

當她哭着回去時，就問父親：是不是有兩個天國，一個中國人的天國，一個外國人的天國。

「我常想，美國人總說：人人平等，宗教中也常

告訴人：對別人好，為什麼傳教士却不這樣做。」

「每次，看到母親不愉快，我也很難受，總是想，天堂與地獄一定也是分開的。」

漸漸的，她不上教堂，也不信教。「我為自己創了一個宗教：不做壞事、不害別人，能幫人處就幫人。」

儘管童年是寂寞的，可是，就由於這孤寂，使她愛同大自然接觸，假山、游魚、花草與樹木，全是她的玩伴，就在這般清雅的環境中，培育出了她一番清靈、高潔的思想。

她自己也常這樣說：在寂寞、孤單的童年裏，許多的事物，完全靠自己的腦筋思索、探索；在追索中就獲得了新的見解。

求學與教書

「我小時很聰明。」

趙教授帶着自傲的神色這樣回味着，那神態，彷彿她又回到了七十多年前，純真與稚情，無邪與依戀，那時的一切情景與溫馨，重又回到了她的身邊。

「三歲多一點時，父親總愛抱我坐在膝上，要我

讀聖經，父親只要教一遍我就會讀，教兩遍必定會背。」

爲了鼓勵她背聖經的興趣，每背一章，父親就給她一張卡片，背十章給一大張卡片，十張大卡片，父親就換給她一元美金。「每拿到錢，我就捐給教會，請他們轉給中國。」

一直到現在，童年時背誦的聖經，她依然記得，因此，趙教授說：「我自己做老師以後，堅持要學生背誦，要知道背書的用處是很大的。」

回到了中國以後，趙老先生就沒有時間再教女兒，只有爲女兒請家庭教師在家中背誦古文。

「父親先爲我請了位廣東老師，我就學會了廣東話，後來換了位江蘇籍老師，我又學會了上海話。」

她記得，不知聽那些同學教她背三字經，改爲「人之初，狗尿多……」老師來，她也照背，於是，老師和長煙斗就老是敲她的頭。「當時，我一點也不懂，爲什麼老師老打我。」

隨着老師籍貫的不同，趙教授就學會了寧波話、江西話……「每換一位老師，就又重學一套，由於調皮，常常，我學會了大堆罵人的話。」

接着，她的母親決定送她到上海去唸美國學校，在那裏，她更孤獨，老師和同學都不歡迎她這位中國人，而且，每到放假，同學都回家，只有她住在校中，偶爾，應賽珍珠妹妹的邀請，到她們家做客，其餘的時間，只有在冷清的校園中，孤獨地默數着時間過去。

「在學校，明明我成績最好，可是，老師非說我不好，那種歧視，使人受不了，因此我暗暗發誓，一定要學好英文，要比他們自己學得更好。」

於是，她真的做到了，這也就是未來的日子中，她雖受到挫折和打擊，而她始終能堅強地生活着的道理。

十三歲時，趙教授到北平，在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學習音樂，主修鋼琴和聲樂。

那段學習的生活，是段美好的歲月，她與當時藝術界人士都有着交往，梅蘭芳、齊如山、齊如水……等，她常常這樣說：「我是屬於那個時代的，只是，當年的友人都先後作古了。」話音中，有惋惜，更有無限的感觸。

接着，她進入聖心女校就讀，只是，她懂得太多

了，老師沒法教她，只有要她去教幼稚園，做一個「小老師」。

「小老師」，是她教書生活的起點，一個奇異而美好的開始。「第一次領的薪水是四十銀元，我好開心，趕緊湊了些錢買了架打字機送給父親。」

那架打字機，她一直帶在身邊，六十多年裏，她遺失過太多的東西，其中有親情、有青春，還有骨肉以及愛情，可是，那一架蘊蓄了無限愛意的打字機依然存在。她臉上閃過一抹淒然的苦笑：「現在，它已經是古董了。」

十四歲時，她孤零零地一個人遠渡重洋，到德國萊比錫音樂學院去深造，天賦加上苦學，一年半，也就是十六歲時，她拿到了博士學位。

民國八年，年輕的趙博士回國了，她結了婚，同時，也在北平女子高等師範教書。

記得，是在紀念趙博士獻身教育五十週年的慶祝會上，一大羣「老學生」，圍着她



紀念趙麗蓮博士獻身教育五十週年，王亞權贈送紀念品

敍舊，而昔日的這些學生，如今都是社會上知名之士，更有些是著名的教育家，像王亞權、江學珠、張岫嵐、王玉川、杜元載、唐國楨等。

那天，老學生們一個一個地回憶趙老師昔時的風采。

他們說：五十年前，趙博士初初走上杏壇時，對這位才十九歲，年輕、漂亮、高雅，「不中不西」的小老師，即刻轟動北師大的校園，男學生、女學生，成天圍着這位可愛的老師的影子轉。

婦聯會總幹事王亞權說：趙老師當年真美，每天換一套漂亮的衣服，人也最和氣，整天都笑咪咪地。

江學珠說，第一次見到趙博士，心想這一定是外國人，而且，一定是教英文，沒想到，趙老師是中國人，而且還教大家的音樂。「當時，同學們對趙老師崇敬得很，也愛慕不已。」

已故的老教育家鄧萃英曾回憶着說：「我是廿九歲做老師的，當時我的學生有二十六、七歲，我覺得很惶恐，怕自己太年輕沒有威嚴，特別留起鬍子來，沒想到，在校園中我遇到比我還年輕的教授，那就是才十九歲的趙博士。」

在教書時，這位美麗的女教師，富家的少奶奶，却是全心全意地教書，為教育，她奉獻一己的馨香。

「記得，我剛生完第三個兒子不久，有一天，北平某大學的學生來和女師大爭奪校舍，雙方學生僵持在校門口，交通全斷了，可是，我孩子吃奶的時間到了，我必須回去。我去求守門的人放我回去，沒想到，他不但肯，還罵我：你養了孩子還要教書，你的孩子就該餓死。」

這頓毒罵，使年輕的趙教授手足無措，又氣、又急，她氣得連說：「但願你養不出孩子來。」對文雅的她來說，這是她想得出最狠毒的一句回話。

「一個人的生活中，怎能缺少孩子。」這是她這一生對生活唯一的偏好，只是，世事多變，隨着一切苦難的變幻，她竟失去了自己的一子一女。

「所以，我要教書，我只好把別人的孩子和我的學生當成自己的兒女看待，一批又一批，看到學生，我就找到快樂。」

因此，從北京高等師範起，北師大、國立女子大學、北京大學、中國學院、藝術學院、燕京大學，一直到臺大、師大、清華、交大、警官學校等，五十多

年來，她的腳下一直沒有離開過講台，拿着粉筆的手，寫過一個又一個的黑板，也教育了無數又無數的學生。

「人，尤其是老師，我覺得是永遠不會死的，因為，思想和精神會一代一代地傳下去。」

她熱愛教育，而且，始終退而不休地持着粉筆，傳道、授業和解惑，她啓迪了他人的智慧，也為自己的生命拾取了快樂與光采。

學英文之道

「趙麗蓮」，這個名字，似乎就代表着「英語教學」四個字。

我請她說說該怎樣學英文。

她說，學英文的途徑有三。

一是要知道為什麼學英語。「很多的人，就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學英文，沒有目的，盲目的學習，尤其是學生，為了應付考試而學，許多畢了業的人，走入社會，做事了，這時才恍然大悟，只是已經太晚了。」

一是要明瞭英文的重要性。「現在很多人，一心

只想學英文，總以為英文學好了，將來就會有前途。其實，這可大錯特錯，我一直認為，你必須先學好中文再來學英文，有些家長先讓孩子學英文，再學中文，就以我的三個孩子來說，我是先將他們中文底子打好，再學英文。因為，腦子成熟了，再接受英文，更方便些。」

另一點是，學英文千萬不要受騙，一般人都有一個看法：音標學好了，發音一定好，音調也才會美。

「其實，音標認清楚，發音並不一定會準確，要注意的是說話機構發音的方式，像唇、舌、喉、鼻等都是極重要的。」

對這一點，趙教授有着太多的感觸，因為，在中學教育當中，許多的老師不知道怎樣用自己的嘴去發音，只是唸音標，因為自己發音不夠準，用來教學生，於是，音就愈不準。

「我們最大的缺點，是不知道中文的發音方式與英文發音的不同處。」

中文的發音，大多數是用嘴的前面，如唇、舌和牙，都要產生較大的作用，而不是用喉部。趙教授指出：「外國人發音和我們的不同，就像吃的習慣一樣

，他們喜歡嚼牛排。因此，中國人發音的缺點，就是動得不够。」

一般人的缺點是，對英文中的M、F、B等的音發不好，「末音是很重要的，我們常忽略掉，要知道，省略了一個字或是一個音，都會影響到會話。」

許多的人老是埋怨，沒有機會講英文，所以學不好，「其實，不僅自己要講，而是必須會聽才行。許多人常常死背會話，可是只要人家問一句，可就答不上來，原因就是自己不會聽。」

「有的學生只會死背字彙，却不會將認識的字串成一句話。光認識字，光會拼那些字又有什麼用，我總覺得，我們的老師沒有創造心理，應該啟發學生才對。」

在螢光幕上主持「鵝媽媽教室」時，天天與兒童相處，她發現中國孩子與美國孩子的心理完全不同，因此，「我時常說，學一國的語言，必須先要知道，自己生活的環境與別人環境的不同。」

「我主張，用我們自己的環境作為書中的背景，不要用西方那種大家不熟悉的環境來教學生，譬如，英文課本中，我們不一定教初學者刀、叉等，可以用

筷子、碗，用孩子們日常慣見的物與事來教他們，我相信，他們學習的能力和興趣都會提高。」

在大家一窩蜂學英文的情況下，趙教授的感覺是，英語的程度反而愈來愈退步。她分析原因在於：目前的學校都是升學制度，學生們只為應付考試而背生字，完全不知道去活用每一個字。

她認為，我們的英文課本內容就該改進。「現在正是政府致力於十大建設，我們的課文可以教授這方面的常識，鼓勵學生活用知識，再說，翻遍所有課本，很難找出有關教導學生做人方面的題材，為什麼一定要用不切實際的西方的文章呢？」

在文法方面，她指出，大家的通病就是死背，「其實，平時的練習，不必用填充方式，可以用簡短的小作文來練習，譬如 *My name is*……很簡單的句子，無形中就訓練了大家的表達能力。」

儘管，對目前的英文教學，她由於客觀的因素，已經一再地氣餒，不過，她仍堅持，教書是她喜歡的工作，而教英文是她的志趣，因此，他堅持，儘量抓住每一分鐘的時間，達成教授大家說「好英文」這一個目的。

愛國的情懷

有一天，我又去看望她時，才一走入客廳，她即拖着胖胖的身軀進來。

「真氣人。」趙教授急急地對我說。

那天正是她到醫院去檢查的日子，她說，在醫院中，竟有人問她是那一國人。「我說我是中國人，他竟問在歐洲那裏。」

一面說，她一面氣，在她的感覺中，這樣的問話對她有着輕視，更有一份被誤解的酸楚。「就像有一期華視週刊，說我不久前才加入中國籍。」

趙教授說，她有足夠條件可以作外國人，可是，她最最榮耀的是「我根本就是中國人」。

她說，從很小、很小的時候，她就愛中國，而且和她父親一樣，具有着濃郁的革命思想。

「在美國時，父親就一心要革命，國父是他的朋友，而家中來往的，全是一心想推翻滿清的留學生們，每次在我家中聚會，一說就是大半夜，偶爾，半夜醒來，我們也聽到很多似懂非懂的話。」

最難忘記的是，四歲時，父親指着一幅漫畫給她

看：一隻漂亮的碗，四周圍着狗，父親說：「這些狗代表着英、美、法……國，他們要瓜分中國。」

那幅畫和父親的話，深深烙印在她的腦海中，而「中國」，也就從此逐漸佔滿了她整個的心靈。

高聳的鼻子，微藍的眸子，襯上灰白的髮絲，真的，趙教授的外型是有着濃濃的西洋味，可是，她的思想，她的生活以及她的觀念，可全是「中國又中國的」，她常常重覆的說：「我本來就是中國人」，這是她的驕傲，也是她的榮譽。

她說，七十多年前，美國一切都不開化，物質條件比起當時的中國差多了，因此，在美國人的眼中，來自中國的物品可真是珍貴。「那時的中國人，又似乎太自傲，太老大了一些。」

物換星移，隨着時代的改變，如今，中國人竟有了崇洋狂，「爲什麼，爲什麼？」趙教授常常這樣問自己。

這些年來，她每天接觸的就是學生，可是，這代的青年好些令她失望，她說：「他們太現實了。」學英文，目的在出國，看到洋人眼睛就亮了。更有，「我最討厭一些青年，才出國幾年，一回來，就是我們

美國怎樣，令人氣，也令人厭。」

西方是不是天堂，這是她要告訴每位中國人的，「在中國，你有溫馨，你有自尊，更有着優美博大文化的光榮。」她說，這些是寶，不抓住，等到失去了就晚了。

她曾經殷殷地對青年說過這樣的話：「在這個國家多難之秋，我們每個人應該努力的目標，該是力求把分內的工作做得盡善盡美……孩子們，當你們要單獨起飛時，我不希望你們飛得太高，我只希望你們飛得平穩……在往後的歲月裏，如果你們只一味的追求權勢，到末了，你會發現，你在這世上一無所有……。要儘可能地養成自己的獨立性，但是，也要有友誼和愛，友誼是一種犧牲，正如愛是一種犧牲一樣。」

勇敢的人生

「我老不爲自己想」。趙教授說，這就是她生活的哲學。

「我不能想自己，那樣煩惱太多，你只有將自己忘掉，從工作中找尋快樂，生活才有意義。」

認識趙教授快十年了，和她走往得這麼近，還是

近年的事，也可以說，是在她患了白血球過多症以後。

初初聽到她生病，內心有着傷感，也有着憐惜，見到了她，可真驚異，她平靜、樂觀，而且充滿着生的意志。

四年前，「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，從來就沒生過病」的趙教授，因為腿痛，再加咳嗽，她住進了醫院，沒想到，竟然是白血球過多症。起初大家瞞着她，「可是，我心裏有數。」於是，醫生就常和她討論病情，她成爲了一位最勇敢、最樂觀，也最合作的病人。

她定時到醫院檢查，按時的服藥，然後，她就忘掉了病，盡情地工作。每次從醫院回來，她總會興奮的告訴人：「我的白血球又低了些」，那神態，年輕而快樂，就像是個剛從學校拿回獎狀的小學生。

「我已經想開了，因爲，這一生我沒有白活過，我做了很多事，而這些又全是我喜歡的工作。」

在這段日子中，她喜歡上了「翻譯」，「翻譯的樂趣是無窮的。」

她將總統 蔣公嘉言譯成英文，也曾經譯過包青天的劇本，在翻譯過程中，有時遇到「天地、父母……」等句子，她總費半天勁，然後若譯得妥適而漂亮

，那時她就好樂。

七十多年的人生，她嚐盡了悲苦，也擁有過歡樂，但她也受到了別人不曾體驗過的寂寞及淒冷的生活，一個寂寞的混血女孩，一個受盡欺凌的富家媳婦，一個走散了子女的母親，一個堅強而孤獨的學者：……七十八年的點點滴滴，這一生的悲涼與淒清，趙教授決定，自己寫出一切來。

「我是用故事體裁來寫，人名都用假的，這可以說是我的自傳，又不全是自傳。」

每天，她坐在打字機旁，努力地寫着，「我已經寫到了第十八章，不過我還沒有寫到我自己的出生。」可以想像的，這將是一本長而美的小說。

聽她聊天，看她工作，感覺中，她是位奇特而勇敢的女性。同時，趙教授也是位懂得生活情趣的人，陳舊的日式平房中，幾把藤椅，好幾大堆的書，她都安排得乾淨俐落，而園中盛開的杜鵑，以及鳥籠中跳躍的小鳥，生活得清悠而雅緻。

• 她常常一個人寂寞地走入餐廳，一份西餐，一盤烤肉，她靜靜地享受着，可是，每要付賬時，總會發現已經有人付了。那些對她好的陌生人，有時對着她

叫老師，因為，都是沒有見過面的收音機旁的學生。

有時，她上了計程車，下車時，司機殷勤地扶她，而且不收車費，因為，這又是一位學生。更有的時候，一些紳士向她鞠躬，因為，他們的孩子曾是她的學生。每在那一刻，她感到滿足，也覺得快樂，心裏有着無限溫暖。「這就是教書的快樂」，這是她的結論。

一直，她就是個不講究未來的人，她說：「我是一天當一個生命在過。」尤其是現在，她更緊緊地握住每一分鐘，她不畏懼生命消逝，怕的只是，還有些理想和工作，沒有太多的時間來實現。

歷經了悲歡離合的人生，早已養成了淡泊寧靜的心懷，每當深夜，每逢清晨，當她繞室徘徊時，也會細數過去歲月中的繁星。

面對着她慈祥而無憂的臉龐，再諦聽她勇敢而熱誠的一生經歷，我的耳中，響起了她的學生獻給她的詩句：「您的存在，是一個渾然無闕的存在，是一個足以歌頌的存在，像一座屹立的高山，櫛風沐雨，歷千載而不腐，像一座高懸的天堦，光芒萬丈，歷千年而不滅。」